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非烟】	学生连记	金宏达
【不堪回首】	师大二附中八·二五事件	杨大同
【劫后反思】	辨识文革时最常见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下）	陆小宝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非烟】

学生连记

· 金宏达 ·

进入21世纪后一个秋日的下午，河北涿鹿县城北的一片菜地间，一群鬓发花白的五六十岁男男女女，异常兴奋地踏看着、寻找着，且不时大声呼叫着：“对，这儿就是猪圈！”“这儿是伙房，没错！”“我们二排的房子在这儿。”“连部！连部！快来看！”

他们所说的这些，地面上并不见早先的存在物，唯有一点点遗迹，大致的方位，三十来年后，此来，已是执行一项类似于“考古”的任务了。

他们原属当年驻此的一支解放军部队的学生连，仅仅“学生连”这个称谓，于今天的人们，已有过于生僻之感，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化石般的留存……

一

1968年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京城的大专院校。其时，学校里已有原应于头一年夏季即该毕业分配的一届，与当年的一届学生等待分配，于是，遵照有关指示，该分走的均分走，留有一部分先送解放军中接受“再教育”。这一部分人中，既有已分配留京、留校的，也有已定下分配地点和单位暂不派遣的，此外，还有上一届已分配的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滞留者，和有问题或严重问题（政治的、道德的各种问题）不予分配、留待处理者，用当时的说法，即“左、中、右”都有。我即是一个“右”的例子，原在的班级同学都已奔赴工作岗位，留下一摞材料，内定我为“右派学生”，留待后期处理。那时我所能设想的前途，只是在某个荒漠的农场中，被群众专政，度此一生。我浑浑噩噩，听由摆布，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带上自己的行李去规定的地方集合，而后被送上西去的列车。

我们所到之地是河北省的怀来县，又叫“沙城”。今天开发商们会把栽几棵花树的楼房叫什么“花园”，凿一条水沟的小区称什么“水乡”，殊不知我们的先人何等诚实和大气，此地常常漫天风沙，径直就叫“沙城”，毫无讳饰。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整个小城似乎都笼罩在蒙蒙的土黄色尘雾之中，迎面卷来一阵冷风，使人睁不开眼睛。向西走约摸一二里，便是部队的营房。到了营房门口，我们的队列却受到了出乎我意外的热烈欢迎：一队绿军装、红帽徽的士兵分列两旁，敲锣打鼓，并有节奏地喊口号：“向革命同学学习！向革命同学致敬！”

我已有许久不被置于革命人民之列了，此时，只觉得自己是不配被“学习”和“致敬”的，颇有混迹其中、自惭形秽之感，相信当时队列中与我具相同身份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一切都不是错的，都是政策的体现。

按照政策，所有送到解放军部队锻炼的大学生，无论何种情况，在政治上都一视同仁，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有问题的，乃至有严重问题的，均在内部掌握之中，最后再说。

对于我这样的人，这真不啻天大的福音。

## 二

我们的指导员姓陈，连长姓朱，都是在这支野战部队服役多年的中年军官，以他们为首的一个正规军人的班子，包括副指导员、副连长、各排排长、司务长，直至文书、通讯员、卫生员，统率这支新建的特殊的大学生连队。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肯定受过专门的培训，整个说来，在执行政策方面并无什么偏差，他们大都出身农村，都带有一种天然的纯朴厚道，对人相当和气。

其中尤其是陈指导员，更是有一种娴熟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挥若定的气派，以他时时严肃与亲切交替的言谈，很快就在这群大学生中树立了威信。他军装严整，操一口带湖北老家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时习惯地扬起一边眉毛，使一只眼睛显得格外发亮和有神采。除了在全连大会上作报告，几乎每天都要在全连集合时作队前讲评，讲话不拖泥带水，不冗长杂沓，透出一种职业军人的干练。

他的讲话内容主要依据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强调受过旧教育的学生要接受再教育，要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他敏锐地抓住连队中大学生的种种思想表现，予以解剖和针砭，使得无论是心高气傲还是心狂气躁的人都一概逐渐收敛了心性。

前面说过，这类学生连队的成员是“一揽子”收进来的，组成很复杂。如我所在的学生连，既有似我这样留待后期处理的问题严重者，也有主要是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一批同学，他们已然落实了分配单位，纯是来接受一段再教育，而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都曾夸口“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如今怎么竟被几个级别如此之低的解放军降伏了呢？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又何况还和一些“反革命”“反动学生”掺和一起，搞什么“一视同仁”，此气也实难忍。所以，实在说，一开始思想问题也甚多。

人大约既是很容易被抬起来，不知所以，也很容易被驯服。毋需多久，我们就看到，这些大学生，无论贤愚不肖，都相当老实、听话。

冬天，军营中除了学习、学习，偶尔也安排一点劳动。劳动，主要就是积肥了。一到掏粪池的时候，大家便争先恐后，粪水溅到身上，也尽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一个多人高的粪

坑，跳将下去，誓要刮干净不可；或者，天不亮起床，赶到炮兵连的马厩去抢拣马粪，马粪蒸腾着热气，也全不怕被熏；出去散步，见到遗落在地上的马粪，会脱下衣服抱回来。在学习会上，大家就交谈自己在此过程中洗刷“旧思想”的体会。

朱连长虽然是个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却怎么看还是个穿上军装的庄稼汉。他很胖，嘴唇很厚，话不多，总是教大家怎么干活儿。他要谋划全年的生产和生活，虽然有伙食费，但远远不够，必须生产自救，第二年自己种菜、养猪，前一年需备足肥料。他的省俭是有名的，甚至要大家在路上将风吹落的树枝都捡起来，送到伙房。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他的号召下，都竞赛着做这样的极琐细的事。

### 三

军营中也有浪漫。那时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大家都要向“九大”献厚礼，女生排承担了绣一巨幅毛主席像的任务。像大约有一个双人床单那么大，下半部是朵朵葵花簇拥，不仅图像逼真，而且色彩分明。先做好了木制的像框，可供几个人同时刺绣，日夜轮换不停，终于赶在“九大”召开前绣制完成，连队参加县城里的庆祝游行，很是惹眼。

游行的事也是不断有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来，大家就会集合，敲锣打鼓，上城里去游行，不管如何，且将激情大大宣泄一下。连队有位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才子”，虽然是学新闻的，音乐上却颇有修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最新指示”完整地谱曲，并在队列前教唱：“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家从平铺直叙的散文语调中逐渐转向昂扬，唱上去，唱上去，也能感到一种难以平抑的兴奋。几遍之后，居然能脱开教唱，从头至尾唱下来了。“才子”因而很受指导员的器重，有时在别人劳动时，他坐在自己的床前，不停地搔着头，嘴里念念有词，是执行连里交给的作曲或其他创作任务。但是，有一天，我们竟然听见了他独自一人在宿舍嗷嗷大哭，惊动了连部的人都跑过来劝慰他。问了别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要来和他离婚了。

我们记得，还是刚到部队来没多久，他的新婚妻子就来过一次。极偶然地一瞥之下，那时的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妻子年轻而且漂亮，小鸟依人地傍着他，“才子”不好意思地回应大家艳羡的目光，又须臾不离地望着自己的爱妻。

部队明确宣告不许谈恋爱，但是对已婚者的配偶来部队探望，仍是很人道地安排招待所，让夫妇短期同住。“才子”的漂亮妻子接连来过两次，仅是这一条，就让我辈羡慕得要死，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姻缘会如此短促呢？

令人感伤的还不只是这一点，“才子”的身世更是叫人为之长叹。他十几岁就参了军，跟随部队进过西藏，后来，居然一举考进了（不是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这在五十年代真正是响当当的“名校名系”，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的才华。五七年“反右”，他因为写大字报乱“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几年后，帽子摘掉了，仍回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时赶上“文革”，分到工作单位，单位负责人一看他的档案：“摘帽右派”，不敢收留，又退回学校，既然是分不出去，便“寄存”到学生连来了。

滞留学校的一段时间，以他的身份不便去参与“运动”，闲时就到处逛逛看大字报。一次在北大附中，邂逅了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这个女生，该女生对他一见倾心。爱情的力量端的是无可阻挡，无论家庭如何反对，她就是铁定了心，要嫁给这个年龄大她许多、前途未卜

的“摘帽右派”。他来到“学生连”，她也立即接踵而至，曾经强烈要求留下，未获允准。然而，爱情的力量最终还是抗不住世俗社会的高压，她决定要和他分手，其时，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或者正是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孩子未来将面对的命运，迫使她必须尽快做出这个选择。所有挽回的努力都失败了，包括指导员也出面做她的工作，预言这个才华出众的人一定会有不错的前途。然而，决裂是异常无情的，她起诉到当地的法院，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当他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眼见有一个男人在门口等待着陪伴她……

他就像大病一场，消沉下去，再也难唤起那种富有感染力的激情。

#### 四

在那里，我自己也曾遭遇过一场浪漫。

尽管我背负着相当严重的罪名，来到学生连总算暂时安顿下来，我的一位通过几次信却尚未谋面的女友，一意要趁春节来看我。她在北京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把长途电话辗转打到团部，告诉我她到达的车次，这使我或者连部都推却不了。我们还没有正式明确恋爱关系，所以只能告诉连部她是我的表妹，连部则认定来者必是我的“对象”，甚至干脆按部队的称呼叫“家属”，使得双方的关系迅速脱离暧昧而定位。

临近除夕，列车上只走下很少几个旅客，我很顺利地接到女友并将她带回到连队。因为她也是一名大学生，不容置疑地立即被安排进和我们一起接受再教育的行列，一起去贫下中农家中吃大年夜的忆苦饭，也一起去看县城礼堂的文艺晚会，只是在熄灯之后，我和她才避开众人走到操场上去谈话。

记得那天夜晚的月色分外皎洁，周边的一切仿佛都披上了一层银霜，尽管我一再向她吐露自己对前途的担忧，提醒她一定要做切合实际的考虑，却还是渐渐地忘却了身置何处，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美好的银色世界的主角，一径喁喁低语，交流彼此的爱意。

部队是禁止谈恋爱的，此举无疑触犯了天规，可是，直到现今，也想象不出究竟是谁在侦伺，四周似乎根本没有人影。不过，如果不是后面又发生的事，这也许还不会被大加责难。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连队照例吃两顿饭，九点钟吃完早饭后可以自由活动。既然女友盛情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食品短缺的时候和地方，为什么不拿出来和朋友一起共享？从北师大一起来的人中，原就有一些是相识和要好的，恰好有一位天文系的姜兄已婚，老婆从老家来了，连队安排他们住进招待所。房屋虽是出奇的窄小，却好歹是可以自己支配的空间，大家遂相约借那里一聚。

聚会前后不过延续了一个多小时，五六个人，说些无关严肃的或沉重的或敏感的话，主要是吃。我们似乎已从厄运的阴影中脱身出来，在这传统的年庆日子，居然还能享受到如此轻松和亲切的气氛，品尝从首都北京带来的糖果与果脯，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悦。

很快就到了回连队吃下午饭的时间，集合的时候，我感到气氛有些不太对劲，几位连队首长都神情严峻地站在队列前面，不像往日绽露笑容。随即是指导员讲话，他用了大约半分钟扫视大家，在我的脸上似乎还多停留了一下，然后说，今天，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一小撮人“臭味相投”聚会在一起的严重事件，为什么这些人会聚在一起，很值得深思。大家

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严密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警惕旧思想回潮。当然参加聚会的人也有不同情况，都要做深入检查。

我一听顿时就懵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不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吃了点东西吗？千不该，万不该，是我们几个犯错误或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了，或者说，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实际“身份”，说是“一视同仁”，实际上，还是外松内紧，严密关注。（另外我也实在失于无自知之明，在这里，我们所能领到的人民币就是有明显区别的，大多数人拿的是大学生毕业工资42元5角，而我们少数所谓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则拿的是20元生活费。）

接下来是开展群众性的批判，我们几个被批判者立马拉开距离，自不必说，其他人也尽量避开我们，而我的女友则早已花容失色，她将这起祸事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向我连连道歉，原定的行程也不得不改变，迅即离去了。对于这个年轻浪漫的女大学生，这是一帖最有效的清凉剂，她得以和我的现实生存真相直接接触，关于未来的一切虚幻的想象都被彻底击碎，再经考虑，这一段短暂的恋情也就正式画上了句号。

## 五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连队要开拔到离沙城几十公里以外的涿鹿县，那里有部队的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种水稻，在一个叫“下花园”的地方也经营着一个小铁矿。比起困在营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政治学习来，大家似乎还是更乐意于到广阔天地间去参加劳动。在行军去目的地的途中，宣传队仿照正规部队，不停地演唱和打快板为大家加油。

在我们到来后不久，正规部队就接到紧急战备命令“上坝”了。按当时的形势，战事似乎一触即发，由我们接手这支战斗部队的后方生产支援工作，意义就特别重大。我们排有一位也是从人民大学来的哲学系的朋友，精神多少受过一些刺激，当时表现十分亢奋，一次竟然一口气吃了十多块大油饼，弄得他肠绞痛发作，赶紧送到师部的医院急诊，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苏修”就要打过来了，他必须吃得饱饱的，和他们决一死战。

我们住进本团特务连的营房里，朝南一排低矮的土坯房是我们各排的住处，东西两边还有几间房分别是连部和伙房，四周都是水田，离附近的村庄有一段距离，任何一个走近这里的人，都会立即进入我们的视线。

实在说，在这长城以北的地方种稻田的活儿很苦，我们要育秧、挑秧、插秧和一遍遍薅秧，直至水稻成熟，割秧、脱谷、打场。大家整天泡在泥水里，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碰上冷天，寒风吹过，沾满泥巴的腿上，会绽开一个个小口子，疼如刀刺，有人只好用胶布贴上，两条腿就像布满了白色的鳞片。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已经被证明能承受部队的生产任务了，他们年龄一般比正规部队战士稍大，又有了吃苦的精神，干起来似乎还更能胜任。风吹日晒，一个个脸黑了，身体似乎也壮了，学生连的人穿着破旧的军装，有的剃了光头，休息日里，三三两两走在街上，还成了当时涿鹿的一道景观。

这样的学生连战士怎不可爱？师部决定召开“大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意在表彰一批先进分子，当时我也被抽去写典型材料。听说邓小平的一个女儿在本师的另一团，师部想让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发言，报上去却未获通过。也大约是这种直接接触和相处的关系，部队对这些学生的态度总体上是宽容、欣赏和亲切的。有一

次，我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号声显得很寻常，大家顾不得洗去腿上的稀泥，往连部跑过来。好家伙，却原来是傅先辉军长亲自来看我们了，这可是难得见到的大首长，忘记了当时他都讲了些什么，只记得这个胖乎乎、笑嘻嘻的首长很是和气，一再叫大学生们往前坐，这件事让大家兴奋了许久。

部队在当地设有生产股，具体管理现场生产活动，有一位副团长，一直亲自督导，对学生连也严格管理，一丝不苟。有一段时间因为调整营房，我们暂借附近村庄的老乡房子住，一天干活下来，疲累不堪，晚饭后，夜色已深，都收拾着准备就寝，集合号却响起来了，原来是通知到营部去看电影《地道战》。这《地道战》何止看了五六次，大家实在不愿意去，无奈“军令如山倒”，只好整队前去。偏偏一等再等，拷贝就是送不到，也不知是谁作了决定：今天不看了，等通知。刚回到住处要睡下，集合号又响了，说是片子到了，还是要去看，有人便恨恨地说，“这不是折腾人吗，枪毙了我，我也不去。”这时天又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于是，有人去找朱连长求情，朱连长实在有点心疼大家，同意不愿去的就不去了。次日一早，队伍到了地头，只见副团长先已到了，黑沉着脸，命令朱连长出列，问他为何晚上看电影学生连不到。朱连长知道辩解无用，嗫嚅着说不出什么，挨了好一通训。

## 六

我们不知道在这里的日子还要过多久。虽然看上去大家相当安定，实则内心里还是希望能快些出去，终究这里缺少自由。不断有消息传来快要分配走人了，每一次连队都会要抓“活思想”，要大家批判临时观点，树立牢固的“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如果是上山下乡，“扎根一辈子”犹有可说，在部队怎么能“扎根一辈子”呢。何况，不久连陈指导员也调走了，去军部的医院去做协理员，朱连长好像是复员回家了。连里又来了一个新的指导员，很年轻，比较活跃，过年的时候，他的新婚妻子从老家来了，就住在连部。爱开玩笑的大学生在他的房门前贴上对联，道是：“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苦干实干生产成果累累。”这相当于现今的荤段子，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有一段时间，女生排留守在沙城营房种菜，我们也很想念她们。身边缺少异性，生活就毫无色彩，尽管有她们在一起，也是严格地“授受不亲”的。后来她们也终于来了，完全是生产任务需要，无意中也解决了一种心理上的缺失和平衡的问题。

尽管部队命令严禁谈恋爱，违者甚至被提到“毁我长城”的高度，然而，青年男女的情爱仍然阻遏不住，不时会有一些“绯闻”传出：谁和谁好上了，他们在暗通款曲；谁和谁相恋被发现了，受到了批评和警告，但是不服，还在“地下活动”。

不过部队毕竟是部队，在这里，无论如何柔情蜜意，也绝对不会出现勾肩搭臂，出双入对的现象，真正从地下转到地上，是在即将分配离队的消息被证实之后。那时，一天之内就有一两起具有某种“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顺着新闻提供者的手指方向望过去，果然，就看见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立着一对男女主人公的身影。虽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大家也能马上判断出是谁和谁。

最具有“爆炸性”的，是地质学院的何君和北师大的李君这一对恋爱关系的公开，没有亲眼看见之前许多人都都不相信。

何君是地质学院有名的美女，顾长的身材，鹅蛋脸，大眼睛，气质很好，据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在当时虽说不是一个好出身，只要父母不是被打倒的对象，对于一些人来说，却也还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一种背景。她在校、系中有不少仰慕者，地质

学院同到学生连的人中也有，但大都畏葸不前，或者就碰过钉子。而李君则完全属于另一类人。他是北师大的有名人物，做过校革委会的常委，因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推翻谭厚兰，被逮捕入狱，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出狱后也被送来此地待处理。李君高个宽肩，方方的脸庞常挂笑容，是个很谦逊、可爱的年轻人。对于这样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特别是一些与何君同校来的人，与其说是不敢相信，毋宁说是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师大来的人许多都有严重问题，虽说部队在教育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事实上总是有区别的，是内控的，何君放着那么多出身和其他条件好的人不找，偏找一个这样前途未卜的人，难道不怕连累自己和家人吗？

大概任何时代，世上都会有一些立意和表现不俗的人，何君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位。她不但毅然将她与李君的关系展现于连队所有人的视线之内，而且还采取了更加令人震撼的后续行动。按规定，何君属于已经分配了工作单位的，首批就离队了，她没有马上奔赴工作单位报到，而是住在北京等李君的到来，却没想到李君未获分配，又被押回学校继续审查。这次审查采取了很高级别的监管措施，完全与外界隔绝，李君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墙上贴着“李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字标语，足见性质之严重（实则后来落实下来并无什么严重问题）。何君来探视，遭到拒绝，但她锲而不舍，执着地向主持其事的工军宣队要求，最后获得同意，二人就在李君被隔离的房子里成婚。

我们无法知道他二人成婚时可有过什么哪怕是最简单的仪式，或有无第三者在场，但是有这样一往无前的爱情到场，他们的成婚无疑是很有亮点的。那个时代无数辉煌的人和事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他们的婚恋，还闪耀在我和我的朋友的记忆深处。

## 七

从1968年秋到1970年秋。我们在学生连整整度过了两年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部队的生活像是一个港湾，有多少惊涛恶浪都暂时被阻挡在港湾之外，学生连时而也会有一些波澜，但大抵都不会使我们有被倾覆的威胁。只是在快要离队之前的几个月，一场叫做“双清”的运动突然袭来，港湾里一时间也真的是云飞涛走，换了一幅气象。

所谓“双清”，一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任务，其实，还是北京市有关方面和我们所在学校交付的，我们人虽然在部队，所属的关系并没有脱离学校。团里派来了工作组，由一位年轻英俊的赵副营长负责，他和指导员的年纪都不如我们中间许多人大，但是，他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我们面前很有威严。

刚开始还没觉出什么，闲散一点的时候，他们还随便和我们什么人说说笑笑，后来，我就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有意回避我们中的某些人。班、排干部在频繁地开会，领受任务回来后，说话渐渐已有所指，大家吃喝拉撒全在一起，可是，你仍然能感到在受到布置妥当的严密监视。

我不幸又成了一个重点。在不指名地批判中，我被称作是少数有严重问题至今未交代的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掌握了什么问题，于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我猜想莫非又是哪位旧时同窗在外地出事，交出我们一起有“攻击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若就是有，也犯不上此时来搞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我早有此类或更严重的纪录。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是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任务需要，另一面是对一些人问题的深浅不放心，还要保持高度警惕。在运动逐渐升温的时候，我们曾被命徒步走到在宣化的师部，参加了一个交代政策的大会，会上当场宣布抓捕了一个什么人，以体现“顽抗到底”的下场。

一切似乎都还处在斗争前奏的阶段，大批人的分配就开始了，人们的斗志一下便松懈下来，忙着告诉家人，整理行装，吃告别酒。这时还传来过一个噩耗，某地一个学生连多人乘的一个卡车，在高高兴兴去某处参加告别活动的路上失事了——一根斜倒下来的电线杆迎面砸死了许多人。大家的反应是必须从快离去。

学校派来了专人——两名军宣队员，将我和另几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前校革委会的常委李君，一个是政教系的周君，还有一个是体育系患精神病而有“反动思想”的曹君）押回去继续审查。我们的起点是学校，终点还是学校，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尽管如此，两年部队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归于零，正像本文一开始所描述的，无论岁月的尘烟如何掩埋，在我们自身的生命成长中，总能找到它的历历遗迹。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追记于2007年，2017年再改。）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 【不堪回首】

### 师大二附中八·二五事件

· 杨大同 ·

我是1965年高中才来到二附中的，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旦回忆起二附中，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尤其是1966年8月25日那个黑色的下午，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下子打死了三个人（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教语文的男老师靳正宇和一名学生的母亲樊西曼）。樊西曼之死是我亲眼所见。一个十六岁花季少女，亲历过那种场面真是刻骨铭心。这个阴影每每忆起不寒而栗。我感到，那个时代，那样的愚民教育，那样的个人崇拜，革命化教育，让我们变得偏执、狂热、屈辱、仇恨，难以释怀。这样的素质教育好吗？

历史是怎样的？那个黑色的八月二十五日我们能忘记吗？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炎炎夏日，文革也进入如火如荼的疯狂时期，当时最时髦的流行词是：“红色恐怖万岁！”那天下午大约两点，我正在女生四楼宿舍，突然听得楼道一片混乱，有人在喊：“都到楼下集合，开批斗会！”“有人杀红卫兵了！”什么？红色恐怖期间只有红卫兵可以随意杀人，杀红卫兵？吃了豹子胆！我也随着人流冲出了宿舍楼。只见楼下东侧的乒乓球台周围聚拢了许多学生，人越聚越多。四十米长的宿舍楼与对面的学生食堂兼礼堂之间形成了一片小广场，中间排列着四五个水泥乒乓球台，每个台上都站满了人，像是舞台又是制高点。球台周围黑压压一片，挤满了师生。我自知出身不好，在班里属于被孤立对象，别说加入红卫兵没资格，就连红外围组织“七一”里的同学也没人愿意搭理我。我偏又不甘寂寞，总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间这一部活书。于是我站在食堂外柳树下，和几个看热闹的厨师们凑在一起观望。舞台中心在一个乒乓球台上，几个红卫兵押着一名中年妇女，她中等身材，短发，被按着头，看不清面容，上穿一件深蓝色人造棉短袖上衣。押解的红卫兵，只记得一个高二女生王×，还有一个高三男生李××，他们正在声嘶力竭地宣布“女犯”的罪行。“罪人”叫樊西曼，就是杀红卫兵“凶手”的母亲，“杀人犯”叫曹滨海，是我校高二的一名男生，已被公安机关收押。被刀砍伤的也是他的同班同学，一名男生，红卫兵小头目，叫陈涵实，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发后，红卫兵们把曹的母亲从牛棚中揪来学校



批斗。原因是，他们在抄家时搜出了母亲给孩子的一封信，认为是曹母教唆所为。不知什么时候，樊西曼已经跪在乒乓球台上，批判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人也越聚越多，大概有几百名师生。台上在念那封“黑信”，母亲写给儿子的信。母亲的信是写自牛棚的，她原任铁道部党校的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从四清工作队回单位接受审查，被隔离关押之中给儿子写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她目前的处境让儿子放心，让儿子相信党相信群众，要理解文化大革命，要经得住考验。

按正常思维听，这信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那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话被曲解成黑话，没有颠倒不了的黑白，没有批判不了的文字。总之认定，就是这封信导致了儿子曹滨海砍杀红卫兵，她就是教唆犯，就是罪魁祸首，就得替子偿命！批判声中，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走资派樊西曼！”“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反革命曹滨海！”台上批判樊西曼的学生怀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像红色娘子军女奴们斗争地主南霸天，控诉得声泪俱下，听的人更是群情激奋，樊西曼简直就是一条十恶不赦的毒蛇！红卫兵先是推搡，后是拳头，揪她的头发，打她的脸。女红卫兵王×终于按捺不住她那高涨的革命激情，一脚将樊西曼踢下了乒乓球台，淹没在人群中。我已经看不见樊西曼的身影，只能看到有人抡着沾水的皮带不停地抽打，后来又挥舞着一根一人多高的木棍，胳膊样粗细，像是房顶上的旧木椽，像舂米一样的垂直往下夯。一下一下，一个人累了，马上有人争先恐后的接班。每夯一下，围观的同学们就齐声大喝一声：“好！”就像喊劳动号子一样。每打一下，我的心就揪一下，每听一声，我的心都颤栗一回。我看到我们班的红卫兵D加入其中抡棒，他长得又高又壮正派上用场。我们班的同学M站在另一个乒乓球台上流着泪叫“好”。…这真是一个人生的舞台。但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樊西曼说过一句话，或是呻吟一声。没有见她有丝毫的反抗，像是一块泥，又像是一块布，任人摆布。后来不知是谁说：“她在装死！反革命还在负隅顽抗！”又有人说：“给她泼水、撒盐！”于是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通往食堂的路，我看到了樊西曼，也许已经是尸体。她平趴在地上，那件深蓝色的上衣已经被打烂，露出了白色的、肿胀的皮肤，和上面条条鲜红的血痕。腿肿胀得像要把裤管撑破。有人从食堂端来一盆冷水泼在她身上，泥水一片，她一动不动；又有人接着往伤口上撒盐，她仍旧一动不动。夏日的阳光之下，众目睽睽呀！这一幕幕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

突然之间，人群又开始大乱，有人喊：“鹿笃根被抓回来了！”于是人流又开始潮水般向校门方向涌动。我也被裹挟在人流中。在通过操场的时候，听到我班的L向身边奔跑的M喊：“M，还不快回家，你妈死了！”原来当天下午，我校初中的几名红卫兵到他家抄家，他母亲见他父亲挨打，一时害怕，竟然跑到厨房抄起菜刀自杀了。刚刚还在泪流满面目睹樊西曼挨打而叫好的M，一时像傻了一样愣住了。当我随着人流跑向校门时，见到被揪住的数学老师鹿笃根。她被剃了阴阳头，一脸的本然。鹿老师五十来岁是个未嫁的老姑娘，长期住在校内教师单身宿舍。不知为什么也进了劳改队，几天前看见她在扫女厕所。听说她出逃到北戴河打算投海自尽，不成想，因为会游泳，求死不成又返回了学校，回归劳改队。

当天晚上，在劳改队里，红卫兵阶级义愤空前高涨，接连打死了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曾任北师大教育系党总支副书记）和高三的一名语文男教师。该教师是一名转业的海军，在部队时因事故致残装着一只假手，上面总是套着一只白手套。教语文的老师被斗的几率最高，课文中难免有一些风花雪月的内容，被说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文革中就上升为毒害青少年。为此高三的学生贴过他的大字报，于是被抓进劳改队。他死后，有人在校园的杂草垃圾堆中看见过那只被丢弃的白色假手。

事后，在断断续续的传闻中我才得知，被打死的樊西曼，曾经是新四军女干部，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党的十一级高级干部。前夫是少将，当时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当时该校属军事院校）。曾于五十年代初领军赴朝，……樊西曼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儿子曹

滨海虽是干部子弟，但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对文革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曾经贴出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砍的陈涵实是他的同班同学，又是红卫兵激进分子，与曹时有争执。这次居然带人到曹家抄家。曹滨海自恃革干子弟，无所畏惧，挡在门口不让进门。争执之下曹拿起菜刀砍向陈涵实，尽管头部伤情不重，但血流满面，酿成大祸。曹滨海被公安局收押，陈涵实住进了医院，成了“英雄”。

曹家被抄，所有家具什物均被从窗子扔到楼下，一把火烧光。这还不算，又将其母从党校的劳改队揪出，拉到儿子的学校活活打死。这一事件成为轰动京城的“杀红卫兵血案”。当天傍晚，我看到北师大的造反团头目谭厚兰，带一伙人到二附中游行声援。当夜他们串联全市红卫兵，筹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曹滨海，掀起又一红色恐怖新高潮。据说周总理闻讯后，紧急接见红卫兵代表，通宵谈话，才制止了更大的行动。

据说曹滨海在狱中终致精神失常。打死他母亲的那些人，王×始终神经兮兮，提心吊胆过日子，随时准备有人来寻仇，从不敢见旧日同学。李××曾被铁道部党校追究打死樊西曼的责任，因李年轻，又是乱棍打死，也就不了了之。

不想，四十多年过去了，十六岁时经历的一幕仍活灵活现。试想，我一个小小的旁观者尚且念念不忘，何况那么多当事人：害人的与被害的，叫好的与旁观的，推波助澜的与点头哈腰的，回首往事会没有心灵创伤？人权和法律何在？樊西曼，一个为共产党打天下的新四军战士，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当她还是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而投身革命时，万不会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弃儿。今天以包容和理解来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历史不容割裂，它应该带给我们反思！这样才能清醒，让历史不再重演，社会才能进步，才能向着和谐轻装前进。

（完成于2005年）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 【劫后反思】

辨识文革时最常见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下）

• 陆小宝 •

（上接zk1908a）

先说“负判断”与“否定判断”的区别。逻辑的排中律中非A，是A的负判断，它们如果一个为真，另一个必为假。但是，“清华不是毛、刘的角斗场”，只是“清华是毛、刘的角斗场”的否定判断，它们不会一个真，另一个必假。所以，将“清华是毛、刘的角斗场”设成A，就不能将“清华不是毛、刘的角斗场”设为非A。那么，“清华是毛、刘的角斗场”的负判断该怎么说呢？它应该说：“并非‘清华是毛刘的角斗场’。”负判断与否定判断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负判断否定整个原判断，而否定判断否定的只是原判断的谓语。在两者差别很大，不能混淆。为了形象说明这个区别，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甲判断，这套沙发都是皮做的。乙判断，这套沙发都不是皮做的。乙判断就是甲判断的否定判断，它们不是一真一假的矛盾关系。因为，这套沙发除了皮的材料之外，它的骨架是木头做的，它的弹簧是钢丝做的。甲乙两个判断不可能同真，却有可能同假。它们都将复杂的客观事物过度简化，犯了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什么是甲判断的负判断呢？乙应该说：并非这套沙发都是皮做的。换成自然语言，这句话就是：这套沙发的有些部分不是皮做的，表示除了皮之外，这套沙发还有其他材料构成。这样一来，它们才是A与非A的矛盾关系，它们才是如果一个真，另一个必假。“都是”，“都不是”，“不都是”，这三个的含义区别很明显。“都不是”是“都是”的否定判断，“不都是”是“都是”的负判断。这样一分析，否定判断和负判断的含义区别，就很清楚了。

例二：甲判断，老李是秃头。乙判断，老李不是秃头。有时候，这两个判断也不是一个真，另外一个必假的矛盾关系。因为秃头属于模糊概念，一根头发都没有，当然是秃头。只有两三根头发，甚至，几百上千根头发，还是秃头。那么，究竟有多少根头发才不是秃头呢？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标准。所以，甲判断与乙判断也不是矛盾关系。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到底哪个真，哪个假。

正因为如此，有些严肃的形式逻辑教科书会告诉你：我们经常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是逻辑概念上的矛盾。因为，“能刺破所有盾的矛”和“所有的矛都刺不破的盾”，两者不是一真一假。它们不能全真，却可能全假。还有，“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句话犯了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因为，如我们在皮沙发的例子指出，现实世界中许多事物有多种成分构成。除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外，社会上还存在许多别的思想，比如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还有，“马列和非马列”，正如我们前面例二所说的那样，也是模糊概念，它们没有确切的分界线，所以它们不是简单的矛盾关系。它们不是矛盾关系，那是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再看“反对关系”与“矛盾关系”的区别。“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和“清华不是毛、刘的角斗场”这两个判断，都属于直言性质判断。看过逻辑入门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直言性质判断，分为“A，E，I，O”四种，它们分别代表“都是，都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四种判断。

世间万物中，有些事物的某些性质，确实可以用全有全无，全是全非的A E来作判断；但是，更多事物的性质必须用有无并存，是非与共的I O判断。忽略了这一点，很有可能就会陷入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那些习惯于简单化和绝对化思维方式的人，往往会强硬地将对方I O判断当成绝对的A E判断，并将A E判断当成一对一错的矛盾关系，然后认为自己必定正确，对方必定错误（这是另外一个逻辑谬误，叫稻草人逻辑谬误）。尤其许多抽象概念和模糊概念，它们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许多人为此争得死去活来，最后成了这种争论的牺牲品。

以上所说的是“都是”和“都不是”类型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非黑即白逻辑谬误还有两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用另外两种逻辑矩阵来说明。它们是：模态判断逻辑和规范判断逻辑。模态判断逻辑只是将“A，E，I，O”的“都是，都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依次换成“必然是，必然不是，可能是，可能不是”。它们的对当关系也与上面相同。如果将反对关系混淆为矛盾关系，就可能成为逻辑谬误，也是一种绝对化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它忽视世界万物的种种可能性，习惯于用“必然是”和“必然不是”来概括纷纷芸芸和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其实，即便是某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规律，比如，有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也只能说这是总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总趋势的具体过程中，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规范判断逻辑是“必须，必须不，可以，可以不”四者的对当关系，也与以上相同。将反对关系混淆为矛盾关系而可能产生的逻辑谬误，表现在对行动的规范上。它也是一种绝对化和简单化，它无视客观世界的千变万化，都用绝对的、断然的行动方式去应对。一个组织必须有规范，有自己的纪律，尤其在军队，许多时候必须令行禁止。但是，习惯于这种统一命令式的方式来管治，缺乏灵活性，没有应变，不考虑区别对待，这样的乱指挥，往往导致失败。

文革中，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充满了这种“彻底，必定，必然，必须”的绝对化和简单化。从以上三个逻辑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很容易导致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

## 二、非黑即白在政治运动中的体现是赶潮流走极端

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在我国由来已久。建国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政治运动期间，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特别泛滥。虽然，文革时，它的表现最为明显，其实在文革前和文革后，这种思想方式一直存在，为害匪浅。但这三个时期，非黑即白思维谬误的表现各有特点。

一，首先说文革前，它的表现特点是“一刀切”。在三反五反、反右和大跃进等等运动中，许多失误都是由此而起。尤其是所谓的大跃进，最高领袖发起运动，中间领导层层加码，底下群众一哄而起。不加分析，不作区别，不分青红皂白，只讲左右。左就正确，右就落后。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泛滥成灾，给全国的经济造成严重混乱，甚至大饥荒。

一刀切，是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一种表现形式。一刀下去，切成两块；一块是对的，一块是错的。这种思维方式肯定要出问题。对这一点，我国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早在50年代就看出来了。我看过一本书《金石为开》，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金岳霖是写对联的高手。有一次，金岳霖给他的学生欧阳中石出了一个上联：“一切切切不可一刀切”，让欧阳中石对出下联。这个上联的逻辑涵义非常深，文字难度也非常大。欧阳中石想了50年都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下联来。直到金岳霖去世后，欧阳中石还在想这个上联。不过，现在他想的不是怎么对出下联，而是考虑其中的逻辑意义。

欧阳中石发现，老师的这个命题有问题。一刀切造成问题不少，但是一切不要一刀切也要不得。有些问题的处理还是需要一刀切的，比如学生考试的及格分数线，领导干部退休年龄，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一切一刀切”是错误的，“一切切切不可一刀切”是“一切一刀切”的否定判断，它也是错误的。“切切不可一切一刀切”才是“一切一刀切”的负判断，它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做法。为此，欧阳中石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极端主义思想方法造成的错误，不能用极端主义的方法去纠正。这一点，对今天我们反思文革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以上一刀切的故事引起我的兴趣，我不禁在想：一刀切，用英文怎么说。我在美国学者韩丁的一篇文章《应如何评价大跃进》中，找到这个词的英语表达，它是：One Stroke of knife。韩丁的文章讲，大跃进的错误是一刀切造成的，而当前中国主流学术界在论述这个错误的原因时，又是犯一刀切的非黑即白毛病。他们“把毛和毛主义者斥为偏激，极左乌托邦，唯意志论。同时却赞扬刘少奇和其官僚体系为一贯的、冷静的混合经济路线。”

韩丁认为，在大跃进期间，刘派官僚把农村搞得一片混乱，有可能是他们有意地对毛的反击。他们采取一刀切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将所有果树都砍掉去种谷物。毛号召深翻土地，他们就要求把农田耕地二英尺，甚至三英尺。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极端化。他说，“在中国官场上，挑衅是一种进攻的有力武器。要将一事情搞砸和罪恶化，没有一种方法比其以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

刘少奇是不是有意用一刀切的极端手法来夺权，我无法判断。当时他是一线最高领导，这些极端化的做法，许多是他推行的，这一点有历史文件可以证明。韩丁的文章起码说明了一点，用非黑即白的手法来为刘少奇洗白大跃进的责任，是不对的。

二，再说文革中，它的表现是：把话说绝，把事做绝，把人往死里整。文革时期，非黑即白逻辑谬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那时，非黑即白逻辑谬误，其实应该叫：非红即黑逻辑谬误。文革时期的非黑即白，有其特定的原因。我看到一本美国的《批判性思维实践手册》上的一句话，也许正好说出了这个特点：“非黑即白是一种危险的谬误，它使得我们得出有些简单化方案，并鼓励我们相信某人或某个思想但不考虑它是否可以更为充分地解释复杂问题。”

文革开始，红卫兵战歌就杀气腾腾地宣称：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要么，革命，一道去整人；要么，反革命，我们马上整你。中间出路是没有的。造反文章，基本不用讲理，不用论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够了。后来的大批判，大都是把抽象的概念分为两个极端，比如革命和反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大公无私和唯利是图，等等，没有中间状态，没有游弋妥协，只有我对你错，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批判性思维所指出的典型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

文革中，除了这种典型的非黑即白逻辑谬误泛滥以外，一些由非黑即白逻辑谬误共生和派生的逻辑谬误也十分盛行。在批判性思维教科书中比较出名的有以下几种：

仓促概括逻辑谬误：举出一个或两个例子，马上推出“全部是”或“全不是”的结论。参加过文革大批判的人，对这样的语句肯定记忆犹新：“够了，够了，用不着再举例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倒×××！”今天听起来，有点像笑话。这种过度概括，仓促归纳的思维方式，在文革中十分流行。事实上，生活在现实社会上的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个体，既有正面，也有反面。如果片面而有意地搜寻事例，即使举的例子确实存在，也可以轻易地将一个人捧为圣人，也可以轻易将他贬为恶魔。林彪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用这样的方式，不怕找不到整人的材料。

追求完美逻辑谬误：用一种抽象的完美的标准来衡量现实世界存在的事物，达不到这个标准，就要否定，就要打倒。“害怕困难，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奉献”，等等。其实，这种所谓“真正的”，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再好的人，也经不起这种抽象“真正的”标准去套，都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文革中，很多曾经被抓坐过牢的共产党员，由于达不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真正”标准，就被打成叛徒。

稻草人逻辑谬误：故意不管批判对象言论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语境，将其推到极端，就义愤填膺地进行批驳，将对方打倒。刘少奇“剥削有功论”之类，大概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虚假两难逻辑谬误：在错综复杂而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中，解决问题的选择，似乎只有极端的两种。现在大家还记得的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把 XX 工程搞上去”，“不是马列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等等。这种“宁要……不要……”，“不是……就是……”的选择方式，往往是绝对的，封闭的，僵化的，用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三，文革后，非黑即白的主要表现是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有人用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认定，有两个司令部，一个红，一个黑。文革后，有人将其倒过来，断定一个司令部坏，代表邪恶，为了权力；一个司令部好，代表正义，完全无私。有人在文章中说，如果认为“他们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而是利益的对抗，就真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他们认为：文革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必须彻底否定文革。其实，这也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

文革错误很大，我们要否定它的极端行为和这种极端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探究文革极端行为的原因，消除产生这种极端行为的根源。

产生文革的原因是什么？不久前，我所在的一个群里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毛泽东是产生文革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持这种说法的人，对形式逻辑中的充要条件概念，完全没有搞明白。充要条件，就是全等于，就是说，毛泽东等于文革，文革等于毛泽东。有毛泽东，就有文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那么要问：1966年前，毛泽东已经存在了70多年，为什么没有文革呢？197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不复存在，按这种逻辑，文革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都没有了，文革就不可能再发生了，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天天在说要防止文革复辟呢？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产生，只要一个充分条件就行，充分条件就是事物产生的原因。而必要条件可以有好多，全部必要条件加一起，就是充分条件。所以，也可以说，所有必要条件加一起，才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人类社会的所有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由单一必要条件引起的。这位同学在论证毛泽东是文革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时，反反复复讲的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这句话没有错。但从逻辑上看，这句话表达的是：毛泽东是文革产生的必要条件，而没有表达出：毛泽东是文革的充分条件。毛泽东是文革产生的必要条件，只是说，他是文革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告诉我们，把事物的原因过度简单化，也是非黑即白思维方式所派生的逻辑谬误。

文革中极端行为的原因很多，而非黑即白思维方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今天学习批判性思维，就是要辨认这个文革中最常见的逻辑谬误，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防止类似极端行为造成的灾害。极端思维造成的危害，用极端思维的方法是纠正不了的。举个例子，文革前和文革中，我国流行空头政治的不良风气。为了纠正这种歪风，有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形式逻辑看，这个口号把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弄颠倒了。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说到头，就是一个蕴含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比大小，比两个概念外延的大小，分清楚是谁蕴含谁？大的蕴含小的，小的被大的蕴含。大的是必要条件，小的是充分条件。写成符号是  $A \rightarrow B$ ，箭头前叫前项，是充分条件，箭头后叫后项，是必要条件。用自然语言表达：“只要 A，就 B”，或者，“只有 B，才 A”。拿“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分析，“抓住老鼠的猫”是前项，是充分条件，“好猫”是后项，是必要条件。抓老鼠  $\rightarrow$  好猫，只要抓住老鼠，这只猫即便偷吃东西，咬坏衣物，甚至传染瘟疫，它也是好猫。这种表达，毛病很大。改革开放后，有些领导干部确实是把经济搞上去了，但是搞贪污，搞腐化，按此标准，这些人难道还是好猫吗？其实，只要将这句话改成“不管白猫黑猫，只有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抓住老鼠的猫”就变成后项，

是必要条件，“好猫”成了前项，是充分条件。好猫——>抓老鼠。要想成为好猫，抓老鼠是必要条件，此外，它还需要满足一些别的必要条件，比如不能偷吃，不能咬人，等等。所以，要肃清腐败恶风，首先得把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搞清楚了。如此看来，学点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确实很有必要。

### 三、非黑即白是对一分为二哲学原理的曲解

胡鹏池写了一篇《必须坚持“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的长文章，一个叫“戴开元博客”的网站全文转载，并在文章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这段按语，我觉得很有讨论的价值，全文抄录如下：

戴按：胡鹏池和我是在同一时代接受同一教育的人。此文显现的作者的思维方式是文革前进大学的理工科大学生的典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尚未跳出马列主义的框架。例如，文中提到的所谓“一分为二”，“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等概念，完全来自文革前中国大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门政治课，在当代学术领域早已经过时。例如，当代哲学根本就不使用这些概念。所以，作者的这种批判是乏力的。具有现代学术修养的人分析文革，不会使用“彻底否定”之类的用语，因为这种用语含有使用者强烈主观价值，而且含义模糊不清。当然，在对文革总体评价上，也就是肯定，否定的评价上，我是站在胡鹏池一边。只是对其思想方式和学术修养的局限性，感到遗憾。

我和这位戴开元先生一样，也是文革前上大学的理工科学生，他说的话对我很有警策作用。检查起来，过去我自己写文章时，每每也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强烈的抽象概念用语。这些概念往往模糊不清，空而无当，但在我们文章里却黑白分明，简单而且互相排斥。哪怕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用几个抽象概念一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个制度善，哪个制度恶，马上清清楚楚，真是实用得很。出国后，接触到批判性思维，读了一些关于思维方式的书，才慢慢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叫做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这些逻辑谬误在中国泛滥，当时大学的政治课教育确实难辞其咎。我完全同意戴先生的论断：具有现代学术修养的人分析文革，不会使用“彻底否定”之类的用语。

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想同戴开元先生讨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到底是辩证法和一分为二哲学本身固有的，还是当时大学政治教育的极左曲解。我对马列哲学认识太肤浅，没有资格来评论。下面只想尝试分析一下，我们中国的固有哲学思想“一分为二”同“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关系。我的想法有两条：第一条，一分为二这个哲学原理，如果学歪了，就会直接导致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第二条，如果学对了，却能成为克制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有力武器。

一分为二，简称二分法。许多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将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叫做“二分法逻辑谬误”。我看过一本美国被人称为批判性思维领域“圣经”的书《学会提问》，其中专门有一节来批判二分法思维方式。书上说：

“很少有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简简单单的是或斩钉截铁的不是来回答。当人们习惯用非黑即白，非是即否，非对即错，非正即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应用二分式思维方法（dichotomous thinking）。这类思维方式往往将一个可能存在多种答案的问题假设成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这种喜欢看待和提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仿佛天下所有问题都只有两面的习惯对我们的思维有毁灭性的破坏效果。”

你看，两分法思维对理性思维有毁灭性破坏效果，这还不严重吗？还不可怕吗？我们在文革中就是这样进行大批判的，文革后我们就是这样来批判文革的。一分为二，成了我们的顺口溜，什么东西都是一分为二，正确错误，好人坏人，正义非正义，不能妥协，不能调和，只能斗争到底。当然，有时候这种思想也还是碰到一点障碍。记得文革期间，有中学生提出“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那都算是很前卫，很大胆的，甚至有一点冒险的问题。因为人们思想中，一分为二就是要指出正确一面和错误一面，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等于怀疑毛泽东思想有错误，这还了得！

没想到，时到今天，有些文革研究专家又碰到当年中学生的难题：对文革能不能一分为二？当年慑于舆论的毛泽东思想全部正确，不敢一分为二；今天是心中笃定文革全部错误而不甘心一分为二。在他们理解中，如果说对文革也能一分为二，就等于承认文革有正确的一面，实在不愿意啊！文革专家毕竟比当年中学生聪明，他们发明两种理论来解决这个难题。一种理论叫“两个文革论”，他们将文革分成两种性质不同的部分，一个叫人民文革，是正义的；一个叫官方文革，是反动的。还有一种理论叫“文革不能一分为二论”。他们说，党中央已经作了定论，文革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意义，必须彻底否定。这是“定海神针”，必须坚守，不能后退一步。这些话的口气，我们听起来很是耳熟，不就是当年“坚守文革绝对正确红线不动摇”口号的翻版吗？他们对党中央决定的这份忠心令人感动，但他们这种理论的理性程度还是应该准许讨论的吧。

正如戴开元先生所说，具有现代学术修养的人分析文革，不会使用“彻底否定”之类的用语。“文革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意义”，这种话太情绪化，太意气用事，一看就知道不是理性用语。日本有一位辅导成人数学的老师名叫永野裕之。他教数学，不但教如何解题，还讲一些学数学的人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很有见地。我读过他写的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唤醒你与生俱来的数学力》，有一段话很生动：

“在数学世界里，要证明 $\times\times$ 绝对不可能和 $\times\times$ 不存在，确实比证明可能和存在还难上许多，困难的程度好像站在一片沙滩，试图证明‘这片沙滩没有钻石’一样困难。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绝对不和绝对不可能，像这样能够完全否认另一种可能性的事物是极其稀少的，这也是为何讲究论据的理性之人，从不使用绝对这种字眼的原因。”

有人认为，我不同意彻底否定文革的可恶依据就是两分法，所以他忙着去证明两分法对文革不适用。其实，用某个抽象原理去批判或否定别人的思想，是文革中的一大恶习，比如去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批判的依据说来说去，就是说人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是很可笑的。那么，科学历史上对这种“绝对不……”和“绝对不可能……”是如何批判突破的呢？前面介绍逻辑矩阵时讲过，“绝对不……”的说法属于E判断，它的矛盾判断是I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一个可以信服的例证，这个E判断就被证明为假。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的人，不用去啰嗦什么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只要他们能举出一个与相对论不符的事实，或者挑出爱因斯坦理论的一个逻辑错误，就赢了。可惜他们不能。那么，我不同意“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事实是什么呢？我早说过，是徐友渔先生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证明的“共识”：文革的积极意义之一，是增强了人们的独立意识。我认为徐友渔先生的证明令人信服，他的结论反映了客观事实。就这一条I判断，就足够将“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E判断驳倒。这就是逻辑的严密的力量。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人，就必须认同形式逻辑的严密性。如果你认为，徐友渔先生的证明不是事实，那么你可以自己去同徐友渔先生辩论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位朋友论述“对文革不能一分为二”时用的论证方式也很有意思，他用形式逻辑的是三段论：大前提，文革是灭绝人性的行为；小前提，灭绝人性的行为不能一分为二；结论，



文革不能一分为二。其实，这里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论证者个人的观点，都需要加上“我个人认为”几个字，同样他得出结论前面也需要加上“我个人认为”几个字才行。把个人的观点作为前提的三段论，逻辑教科书上给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诉诸未经证实的假定”。这种“诉诸未经证实的假定”三段论，除了混乱视听之外没有论证作用。是呀，反正都是你个人的观点，你将这个观点直接说出来不就得了，何必还要绕弯先来个三段论呢？

不过，有位网友从以上三段论看出另一个三段论，他在群里马上跟帖写道：“你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而你又说文革不能分，那么就是说，你同文革联在一起不能分。你说，文革是灭绝人性的行为，既然你同文革不可分，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灭绝人性的行为者。”这个推论在逻辑上很严密，我很难挑出这位网友这个论证有什么毛病。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认同这位网友得出的结论。因为我知道，提出前面三段论的朋友绝不是什么灭绝人性的人。其实，他在论证文革不能一分为二的时候，还是把文革分了类别的。他把自己从文革中分了出来：文革是坏的，非正义；他是好的，他和他的那个派是反文革的，是正义的。他认为，他没有参加文革，他参加的是反文革，所以说，他这个“文革不能一分为二”理论，同前面所说“两个文革理论”其实是一家人，都是两分法，将文革分成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两部分。他们都是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产物。

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第一条想法：一分为二这个哲学原理，如果学歪了，就会直接导致非黑即白逻辑谬误。那么，什么是“把一分为二的哲学原理学歪了”呢？分析以上两种理论，都是对文革进行一分为二。而他们的一分为二，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的分，都是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极端，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第二，他们的分都是只分了一次，没有往下接着再分。他们忽略了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许多事物，忽略了黑与白之间还有灰色地带，忽略了两个极端的相互渗透和互相关联，忽略了除了极端的选择之外，还存在有许许多多的可能选择。这样的两分法，实际上就是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代名词。这样的两分法，必然导致逻辑谬误。

接下去讲我的第二条想法：如果正确理解一分为二，把它学对了，却能成为克制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有力武器。那么，怎么才是把一分为二学对了呢？

对此问题，应该回到一分为二的源头，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这个思想，出自《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椎，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清楚，它不是分一次就完了，它说的是无限可分，要不断地再分下去。毛泽东讲一分为二，也不是说分一次就完了。他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分左中右。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老祖宗那时候，还不了解事物不同层次会发生质的变化，他们以为一根木棒不断分下去，分一万年剩下来的东西还是木头。其实，一个事物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层次去分析，就可能看到不同的现象，有不同的实质，呈现不同的意义。我在香港女战地记者张翠容的书上读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爱以左与右来区分立场，但我认为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在左与右，而是上与下的角度，这就是你选择站在强者 / 征服者那一边，用精英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还是选择透过弱者 / 失败者的眼睛去审视世情。”

从上面分析，对如何正确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我们可以总结两点：第一，不是分一次就完，而是要不断地继续分下去；第二，要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去分。我认为，有了这两点，一分为二就会成为克制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有力武器。前面我们说过，一代逻辑学宗师金岳霖先生为考考他的学生欧阳中石，出了一个暗藏玄机的上联，“一切切切不可一刀

切”，让他回答。欧阳中石也不愧是大师，勘破其中暗含着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可惜尚未对出下联。受这两位前贤学者的启发，我尝试写了一个应答金岳霖先生的下联，希冀由此能找到克制这个非黑即白逻辑谬误的方法。上联：一切切切不可一刀切 下联：两面面面还分两个面

接下去，我们就来具体探讨，如何用正确的一分为二哲学原理来克制非黑即白逻辑谬误。今天，我来说两种办法：一种是对概念进行连续多次的一分为二，使抽象概念逐步具体化，这是我从逻辑书本上学来的；另一种是对待解决问题进行连续多次的一分为二，在无限多的可能选择中找到最优解，这是我自己从别种书上综合而来的。

先说第一种办法。我们知道，习惯于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人，总是喜欢在互相对立的两个抽象概念之间转悠。要克服这种逻辑谬误，首先就必须从这两个抽象概念中跳出来，将抽象概念逐步具体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逻辑语法修辞》书中，将此称为划分法。划分法是指概念的划分，从而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也就是，把一个属概念，划分为许多个种概念。划分的方法可以是一次划分，如将学生考试成绩分为“及格”和“不及格”。更多时候必须连续划分，将一次划分后的子项，作为母项，再次划分下去，构成多层次划分。这就是刚才说的连续多次的一分为二。比如，不少人写文章论造反派，有人说造反派很坏，有人说很好，这样的辩论没有意义。造反派这个概念太抽象，必须将它具体化。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很复杂的，正如徐友渔先生所说是“形形色色的造反”。我们可以将其分成高干子弟的造反派和平民子弟造反派，平民子弟造反派又可分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激进造反派还可分狂热造反派和比较有节制的造反派，等等。以造反派这个抽象概念为题目来研究文革，只能说一些空话套话。如果研究清华文革的造反派，也不要总是拿团派和四派来说事。前些天，我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原学校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会选择“亮相”到井冈山这个激进的造反派，而不是比较温和的四一四？如果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认真调查调查，分析分析，倒是很有价值。这样的具体化研究，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就行不通了。这种从实际存在出发而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选题，反倒更能深刻揭示客观事物的一些普遍意义。

再说第二种办法。非黑即白逻辑谬误，派生出虚假两难选择的逻辑谬误。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面对一个问题，认为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极端选择。文革中大批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中庸是骑墙妥协不革命。被人称为韩国国师的金容沃先生写过一本书《中庸 人类最高的智慧》。他认为，孔子所说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中”，而是射箭射中箭靶的“中”。也就是，孔子的中庸就是要我们在解决问题作选择时，不是选两头极端，也不是选其中间点，而是找出最优化的那个点。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有一句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一直看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三生万物。《易经》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怎么冒出个“三生万物”来呢？三是什么？我的水平太低，想不出老子的原意，就不想了，转用我自己的现代世界观来理解它。在我的想法中，这个三，就是刚才说《中庸》里最优化的那个点。最后选出的点，只有一个。但是，它的可能性却有千千万万。周围环境是瞬息万变的，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最优化点，可以有千千万万个结果。我们要实际问题，就是要从这千千万万个可能性中，选择最符合目标的最优点。

华罗庚先生在文革期间，到处推广他的优选法。我理解，他的优选法就体现了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假设我们面临一个问题A，这是老子说的“一”；接下去，根据事物的定义域，我们在数轴上找到两个端点a和b，这就是老子说的“二”；再就是在线段ab上，去找那个最优的点c，这个点，就是老子说的“三”。线段

ab 端头只有两个点，但线段 ab 之间，有无数个点。最优化的 c 点，也就是那个“三”，具有无数种可能性（c 点也有可能与 a 或 b 点重合）。这就是“三生万物”。怎么才能找到最优优点呢？这就要用刚才说的连续多次的一分为二。

华罗庚的优选法就是连续多次的一分为二。不过他的一分为二，每次不是二分之一，而是黄金分割，0.618。为什么要黄金分割？这是因为华罗庚证明，这样的分割次数最少。其实，如果实验成本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每次二分之一也是可以的。

我看过一本小说《算法神探》，是美国谷歌公司的首席工程师 Jeremy Kubica 写的。作为侦探小说看，这本书有点枯燥，但这位网络总工程师的目的不在此。他的目的是借写小说为由，来介绍现代较高层次的计算机思维和搜索算法。他在书中介绍好几种搜索算法，其中有“二分搜索法”和“二叉搜索树”。他的“二分搜索法”思路完全同华罗庚一样，也是用连续一分为二来找到目标。只是他不用黄金分割，直接就用二分之一来分割，逐步接近目标。

综上所述，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认为，我们解决问题时，只有极端的两种选择。连续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无限的可能性，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找到最优结果。

当然，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二分搜索法的步骤去做。但是，简化的方法在美国已经深入生活之中。我住医院，告诉护士我的伤口痛。护士就问：“如果将痛分成 0 到 10 级，你觉得自己属于第几级？”从问“痛与不痛”，改为问“第几级痛”，别看简单，它其实从非黑即白，进步到一个“度”的层次。这个“度”的概念，十分重要。有度量，才有科学；一个人能将事情做到适度，标志他从幼稚进入成熟。

我们分析问题，不能满足于抽象的“有”和“没有”两个极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分析透彻，把握住适当的时机，适当的火候，适当的分寸，还要注意留有余地。如有必要，也不排除采取极端措施。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调查研究，反复推敲。套句老话，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可不是书生们坐在书桌边，玩弄几个抽象概念那么容易的了。

#### 四、摒弃非黑即白偏激思维，开启务实、理性、创新的七彩天地

以上我们从形式逻辑和哲学的角度来辨识非黑即白逻辑谬误，下面我们再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逻辑谬误产生的认识论原因。

批判性思维这门学科，主要讲如何论证。要论证，首先必须确定要论证什么论题。而所有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都强调，我们在确定论题的时候，必须区分两类不同的论题。一类叫描述性论题，即有关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另一类是规定性问题，即有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前者可以用成型的程序或方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数学和自然科学，基本属于这类论题。后者则为判断问题，它对应各系统相互冲突，这种问题需要根据人的主观选择来得出答案。人们有相互冲突的不同的价值观点，由此，不可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这些不同答案需要进行辩论、协商和权衡，才能比较出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哪个答案比较好，哪个答案比较差。人文学科（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大部分问题属于这一类。

除了以上两类论题之外，有一本叫《批判性思维工具》的教科书，还列出第三类问题：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由人的主观品味决定，比如喜欢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这类问题

只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只要不妨害他人，对此评头论足是毫无意义的。作者把这类问题单独列出，令我想起文革中还有一个恶习，即对别人关于穿衣吃饭等个人的喜好，以及纯属个人主观的生活态度，提高到政治层面去横加干涉，甚至批判斗争。

现在，我国有些大学也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为了同世界接轨，我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录用考试都加有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内容。为了学习批判性思维，我做过很多套这类考试的模拟题。刚开始练习时，我自恃多少懂一点形式逻辑，不以为然，结果连题目都看不懂。原来，考试题中，对描述性论题的论证叫“证明”，要证明论题的正确或错误；对规定性问题的论证不叫“证明”而叫“支持”，评价“支持”的效果，也只是“加强”或“削弱”结论。因为，此类论题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绝对标准。

以上经历，我感触良多。在文革时，对社会热点的许多问题上，比如政治、经济和体制等等问题，我们总以为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法。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围绕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我们辩论，我们争吵，总觉得自己对，别人错。结果，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只剩下武斗一条路。

我们这些工科学生习惯于用平面几何那样的数学证明，现在有人写文章还要动不动就来个三段论证明。其实，他们对三段论并不熟悉，用的几乎全是“凡是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种 AAA 格式。他们还喜欢将这种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的三段论用到日常社会生活的人文领域。因为形式逻辑不能满足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论证需要，以非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批判性思维才会应运而生。在人文领域用这种三段论，是很容易出错的。

为什么形式逻辑不能满足日常生活人文领域的论证需要呢？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自然语言同科学语言的不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念有严格的定义和定义域，而日常语言充满歧义和含糊，尤其是许多抽象语言，是不严密不精确的。比如，“民主”，“公正”，“淫秽”，人们对它们可以有多重理解。将这种歧义和模糊的自然语言，运用到严密和精确的形式逻辑推理中，很容易产生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

我们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中，政治家总是会运用一个或几个政治口号，把我们的思想统合到一个方向去。开始，我们或许对这种政治口号不适应。这种口号喊多了，喊久了，就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引导思想。人们甚至会习惯于用这种政治口号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思想。比如，文革中的“走资派”，就是这样的政治口号。

不久前，一篇《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的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关注。文章作者郭建先生认为，冷静反思造反的正义性，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然是个挑战。他指出，当前文革研究中，有些人将文革中的“走资派”一词偷换成“官僚集团”，这不符合文革语境。他认为，一些造反派，当年反对“走资派”，现在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改口说，自己当年反对的是“官僚集团”。这是他们对自己当年错误的掩饰心态。

我基本不同意郭建先生的这种分析。有一本批判性思维教科书特别指出：“人类思维有一种倾向，就是将自己理解的意义投射到他人所说的词语上。”我们还原到当年文革语境，“走资派”的口号成为社会流行语，不论是真造反派还是假造反派，还是普通老百姓，几乎人人都在用“走资派”这个词来交流各种思想。其实，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之外，对“走资派”的确切含义，谁也不清楚。当时当政者的所谓“走资派行为”，除了“包产到户”之

外，没有什么实质表现。当年人们起来反对当权者，虽然喊的口号是“反对走资派”，其实，内心里真正反对的是当权那些人的特权和官僚主义，以及对老百姓的压制。现在，他们在文章中将“走资派”改换成“官僚集团”，多数人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也不是为自己的非正义找借口，而是回复到当年比较真实的心境。

当然，今天改口的这些人，可能是拥护今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会改口。他们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他们认为，只有毛泽东看出了当年他们其实没有真正领会的东西。

第二，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我们用形式逻辑作推论时，只要形式可靠，前提真实，大家都会认同唯一正确答案。但是，对日常生活问题和人文领域的问题，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针对同一个事实，人们也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形成极大的纷争。

前些天，有一位大学教授在网上评论文革，不少人誉之为“句句犀利”。他在讲话中，激烈抨击文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激烈抨击有些当年知青所写的“青春无悔”的文章。他说，“什么青春无悔，应该是青春无奈”！我认为，评论文革时的上山下乡，类似“有多少知青下过乡”，属于第一类描述性问题，可以有唯一正确答案。类似“上山下乡对农村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属于第二类规定性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可以互相辩论。而“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此类问题只是涉及到面对上山下乡这种境遇时自己个人选择采取的生活态度和内心感受，似乎应该归于上面所说的第三类问题，他人不该评头论足。这位教授认为自己当年是“青春无奈”是无可指责的。但他激烈抨击别人说的“青春无悔”就没有道理了。你从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出发，当然有权认为“青春无奈”；别人从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出发，也完全有权利认为“青春无悔”。这两种不同认识，不能说哪个正确，哪个错误。这位教授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一定要强迫别人赞同自己的观点。这种犀利，不要也罢。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深受感动。本书作者叫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他利用假期，深入到山西西部贫困山区调查，写出了这本真实、深刻、凝重的作品。它的文字十分厚重老到，没有华丽辞藻，却让人闻得到乡土气味，摸得到生活的脉搏；没有抽象概念，却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这位年龄差不多比我小半个世纪的清华校友，让我对他产生一种敬佩之感。他一点都不偏激，不去玩弄普世价值。他只呈现访谈的真实记录，只呈现数字的科学分析，再加上自己的理性思考，却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黄土高原农民的生态样貌，揭示了现代农村深刻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其中“救救孩子”一章，说的是这些年农村中小学推行撤点并校的政策，加重农民的负担，造成农村教育新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出，某些政府部门的“一刀切”作风还是相当严重。书中还有“乡村婚姻”一章，反映的是文革后，结婚索要彩礼的旧风俗正在晋西农村变本加厉流行，拆散不少对自由恋爱青年，并造成许多“光棍村”。我读了之后，心里久久无法平静。

肖亚洲校友深入农村，不是被动的，无奈的，而是自觉的，积极主动的。近些年，我们在新闻媒体也经常看到报道，现在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自愿到贫困山区支教，还有清华博士去农村当“村官”。可以说，这是新形式的上山下乡。这种上山下乡，没有什么不好。文革时的上山下乡是强制性的，是违背许多人意愿的，是一刀切的，是终身的，是以中止学业为代价的。这样的上山下乡确实是不好的，许多人认为“无奈”，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那些“无悔”的人，有他们自己对青春的理解，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肖亚洲校友的事例告诉我们，真理是具体的。坐在书斋里，从互相对立的抽象概念出发，无法判断哪个正确和哪个错误。只有深入到实际中去，通过调查，通过比较，综合分析，掌握分寸，权衡利弊，才能认识错综复杂的客观事实，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就是说，摒弃非黑即白逻辑谬误，我们第一条必须做到两个字：务实。

下面讲第二条，理性。现在网上讨论中国政治的文章很多，但只要一说到有些敏感词，比如文革，毛泽东等等，马上出现激烈争吵，甚至互相攻击。非黑即白，唯我独是。这种现象是非理性的，但是也许短时间很难扭转。我认为，学习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帮助我们走出这种僵持局面。

有一本书，我深受启发。这本书叫《有效思维》，是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1938年写成出版的。中国的翻译本却是2008年才出版。这里面有段感人的故事。文革后，我国80多岁的著名逻辑学家吕叔湘先生，开始翻译这本书，每天翻千儿八百字，断断续续翻了三年。1989年，他得了一场病，实在翻不下去了，把它交给其他同志翻译完成。从这个翻译过程可以看出，经过文革的吕叔湘先生，是多么地看重这本书呀。他一定是将它看成是救赎文革思维的一剂良药。我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觉得虽然它讲的都是形式逻辑，1938年出版，但其中含有批判性思维的雏形内容。这本书阐述的逻辑原理深入易懂，更重要的是，我看到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他在英国报纸杂志和政客演说中，挑选有关当时最具争议的论题，比如苏联、希特勒、工会和妇女权利等等，进行评论。他的评论不触及争论问题的结论，只是指出争论过程中的逻辑错误。我得到的启发，就是这一点。

我想，针对我们现在网上的激烈争吵，如果有一位像当年英国斯泰宾那样的逻辑学家就好了。他不看争论的各家主张，而专门核实争论中涉及的事实，和挑剔争论过程中的逻辑毛病。这里所说的逻辑毛病，包含形式逻辑错误，也包括非形式逻辑谬误。指出论证过程中的逻辑谬误，并不是说，你的结论一定错误，而只是说：“你的论证无效，它不能说服我。如果你坚持你的观点，你需要补充材料，或者换个论证方法。”各方争论的观点，我们很难去判断谁对谁错，这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但是，争论所涉及的事实，是有客观标准的；争论过程中的逻辑，对和错，也是有判别标准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渐将争论纳入理性的轨道。最好有人能开设一个网站，取名叫“理性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功能是只管事实，只管逻辑，监督大家要讲道理，不要走极端，不要谩骂。我期盼有这样的网站出现。

有人告诉我：反思文革最终归结于思想方法没有找到要害，关键在于体制上。我对此有不同想法。文革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有制度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相比之下，文化的原因更为根本。不久前，有一位思想大师在北大演讲，他说500年以来，几千项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成就，没有任何一项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他将其原因归于专制，和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我认为，这个归因不全面。其实，现代科学的发轫阶段，西方社会的专制不比中国弱多少，对异端思想的迫害甚至比中国还要残酷。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形式逻辑和实证的科学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形式逻辑的基因，我们虽然有傲人的古代技术和发明，却生长不出现代科学。现在的西方主流政治制度，也是理性思想的发展成果。台湾争取民主斗争中，有一位逻辑学家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就是金岳霖的学生殷海光。

西方的主流制度不是终极，它还在发展。在我们文革期间，针对自己的社会需要，他们产生了非形式逻辑为内容的批判性思维，正好说明政治制度的硬件，还必须有理性思想方法的软件的配合，才能发挥效能。现在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只要制度改变，一切就万事大吉，是太天真了。

第三条，信仰和创新。前面我们说，许多人文社会的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理想，也不需要讲信仰。人类永远需要理想，也应该有信仰，只是有两条：首先，任何理想和信仰绝对不能违背人性和基本的人类道德准则；还有，任何理想和信仰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奋斗，去实现。有些人从外国引进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把它当成普世价值，放四海而皆准，只有自己正确，别人统统错误。这种非黑即白的做法，不管你的理想和信仰是什么，都必定要失败的。任何理想和信仰，都要适时适地适度，要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拥护你的政治主张的社会力量。非黑即白的思维，只考虑抽象的，极端的两种可能性，是不可能创新的。

创新，有时候是融合不同的元素，将其进行重新组织；有时候则是在大家忽视的地方发现突破性的新元素或新办法。成功人士，在处理问题时，往往能从大众关注的、非黑即白的胶着中冷静思考，找出新的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打仗的时候，攻打一个山头，打成胶着状态，进攻方伤亡惨重。优秀的指挥员能够冷静观察，找到对方的防御盲点，迂回从侧后用兵，迅速夺取山头。在政治的战略上，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当年执着于洋教条，带领无产阶级进行城市暴动，几乎全军覆没。毛泽东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极端点之外，看到农民这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胜利。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开始两党都因循旧的思维，着力在富裕白人和穷困黑人的对立中争取选票。政治素人川普别有眼光，看到在全球化后失去工作机会的中西部白人基层，提出自己的竞选主张，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而当选总统。总之，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一定要适时适地找到支持自己的社会力量。而且，为了找到这种社会力量，就一定要摒弃非此即彼和非黑即白的习惯思维，有所创新。

批判性思维给我们反思文革打开了新的思路。摒弃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前面是一个七彩缤纷的新天地。

〔作者简介：陆小宝，男，1946年生，浙江东阳人。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冶金系，1970年毕业。分配到青海西宁，文革后调到成都、广州等地工作。1993年到美国，现居纽约。〕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